

论马克思“否定的幸福观”及其实践智慧

——以亚当·沙夫的幸福方法论为视角

王 燕*

〔摘 要〕 马克思从“幸福”的否定的方面“不幸(福)”出发来探讨幸福,研究普遍不幸的社会根源,在“消除不幸”这一否定的意义上为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这是一种以现实人的现世幸福为目的的现实主义幸福观。它既克服了“幸福”本身的理想性和抽象性,又为人们追求幸福确立了明确的行动对象,鼓舞人们以消除普遍不幸为直接目标。在现实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汲取智慧和方法,以克服、消除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明显的不幸和不公为使命,脚踏实地地谋求“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从而达到为自己也为他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目标。

〔关键词〕 马克思;幸福观;不幸;肯定的;否定的

“幸福”是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视野中,对马克思幸福观的思想来源、具体内容等方面展开积极的研究,在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个人幸福与集体(社会、阶级)幸福、劳动(实践、创造)与幸福、奉献(自我实现)与幸福、异化与幸福、人的需要与幸福、自由(解放)与幸福等多重维度中考察和解读马克思的幸福观。这些研究当然非常有益于加深对马克思幸福观的理解,但理论和实践总是内在的要求人们持续地推进对马克思幸福观的研究。这样,也就自然需要不断地寻找新视角,做出新突破。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Adam Schaff)另辟蹊径,基于马克思研究幸福的“方法”,提出一种马克思主义^①的“否定的幸福观”。既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幸福观的特殊性、优越性,又紧密贴合马克思本人的精神品格及彻底的人道主义(radical humanism)所固有的批判性、革命性、战斗性和至善性。

当下中国,受物质(金钱、权力)至上观念的侵蚀,人们惯于在“拥有”或“占有”的意义上为自己谋幸福,以占有更多有形或无形的“物”作为生活的目标和衡量幸福人生的标尺。结果,日常生活为“占有性冲动”所支配,个人极有可能“成为自身欲望的囚徒”^②,因占有的多寡或沾沾自喜、恣意妄为,或失望焦虑、消沉烦恼。马克思曾立足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批判这种生活观贬损、吞噬人的幸福,让人“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求福不成反为物役。马克思要把人从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在

* 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21002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CKS033)、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

① 本文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参见《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18页。

② [美]艾里希·弗洛姆:《人的呼唤——弗洛姆人道主义文集》,王泽应、刘莉、雷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4页。

“避免”或“消除”普遍“不幸”的意义上为自己、更为全人类谋幸福。这对于那些普遍迷失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活观、苦乐观的人,无疑具有强心和照明的作用,有助于改进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升个人乃至整个民族追求幸福人生、“幸福国家”的实践智慧。

一、“否定的幸福观”的出发点:不幸

在中西方思想传统中,尤其是在哲学以及道德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幸福”始终是个核心议题。通常,“人们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一般总是从对这个问题下定义开始。否则,用语本身就会引起混乱和相反的意义。谈到‘幸福’这个字的时候,特别如此”。^①因此,对“什么是幸福”的回答自然就成了幸福论的首要任务,幸福的“定义”也成了划分不同幸福论的依据之一。沙夫将这种探讨称为肯定的方法(positive approach)或对幸福的正面探讨,即由“幸福”出发,为“什么是幸福”的问题提供普遍的答案。这是幸福思想史中普遍采用的传统研究方法。但是,在马克思的思想理论中我们找不到幸福的一般定义。尽管马克思早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为“大多数人幸福”而奋斗的远大志向,但他关于“幸福”本身的“正面”、“专门”、“直接”的论述零散、稀少。这正是马克思幸福论的殊异之处:它不是对“什么是幸福”这样的问题提供普遍答案的纯粹理性思辨,而是侧重于寻求回答“是什么引起不幸,以及这种状况的特征是什么”^②。这是对幸福的间接、反面的研究,它从幸福的对立面“不幸”^③出发,研究阻止人类幸福的社会障碍以及排除这些障碍的方法。

“不幸(福)”是“幸福”的对应范畴。在形式逻辑的意义上,二者是不相容的。在《不幸与幸福》一书中,尼尔斯·托马森就是在完全相反的意义规定这两个范畴的:“‘不幸’被定性为那不现实的、分裂的、僵滞的、恐惧的和无意义的生活,而那反过来的则是现实的、协作的、运动的、安全的和有意义的生活”^④。在这个意义上,“不幸”是幸福的反面或“否定”的方面(negative side):“不幸”即不幸福,“幸福”即非不幸。沙夫将由“不幸”出发探讨幸福的方法称为“否定的方法”(negative approach)或对幸福的反面探讨。马克思就是从反面来研究个人幸福的,这一“否定的”方法论立场与其“人类个体的概念”(conception of human individual)紧密相连。马克思以“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⑤作为自己全部理论出发点,当然不允许自己仅仅为“幸福”下一个抽象的定义。对马克思来说,资本支配下的人的现实生活要比那“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更具有吸引力,他从人们对宗教的诚笃与渴盼中听到了“被压迫心灵的叹息”,在街头巷尾、普通人家看到了工人们终日忙碌却不得饱食的现实苦难:失业时,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无穷的贫困、饥饿和绝望,工作时又要遭受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摧残——“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只有在动物的机能得到满足时才能感受到一点可怜而有限的幸福。作为一个“现实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当然不能无视这个苦难的世界,他改变了观察和研究幸福的视角:从追问“什么是幸福”转为探究“是什么引起不幸”以及“怎样才能铲除这些不幸”。

“不幸”的具体表现样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马克思关注的不是作为“个别”

①[波]A·沙夫:《个人幸福的社会条件》,《世界哲学》1962年第1期。

②A.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p. 181.

③即“不幸福”(unhappiness),非“不幸运”(unluckiness)。“不幸运”与“幸运”相对应,都是人生偶有的状态。“幸福”与“不幸福”相对应,是相对稳定的、持久的存在状态。

④[丹]尼尔斯·托马森:《不幸与幸福》,京不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53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3页。

现象的不幸,而是普遍的人类不幸。这并不是说他对个人不幸是无动于衷的,而是因为试图归纳出所有的个人不幸并找出其根源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但找出普遍的大众苦难的原因却是完全可行的。这种苦难因是“普遍的、大众的”,其根源必定不在某个个人的身上,而在个人之外。这并不是说个人对其不幸是完全免责的,而是说:当不幸已经超出个体的范围而为绝大多数人所共有时,仅一味要求个人反躬自省是远远不够的。它或者会使人陷入自我麻醉、自我欺骗,或者会成为既得利益者转移人们视线的幌子。马克思当然不反对自我改造,他要求无产阶级“抛掉自己身上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但他更看重的是滋生、制造这些陈旧、肮脏的东西的社会环境:“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①,正是那违反人性的生活环境使无产阶级无法显示自己本性中“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方面,无法像人一样生活、感觉和思想,只能在酗酒、纵欲、偷盗中萎靡、堕落。“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当决定人的心理或性格的环境发生改变之后,由心理或性格引发的不幸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改变。

这样,马克思就确立了普遍的人类不幸与现实世界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潜心观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必然伴随着无产阶级痛苦和不幸的积累,这是资本积累的一般趋势和必然结局。这种探讨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一方面与致力于揭示幸福的含义或本性的思辨哲学的幸福观相区别,另一方面也与幸福的心理学研究相区别——这些研究旨在分析致人不幸的内部原因,在改变自我的意义上增进个人幸福。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告诉我们:个人幸福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它是个人努力与社会环境的完满统一。经验表明,在总是受到经济危机的威胁、战争的恐惧、集权和官僚压制的社会里,人们是不可能有多少幸福的心理感受的。只要那制造普遍不幸的社会条件依然存在,无论个人怎样努力,其幸福所能实现的程度总是有限的。这就是在剥削制度下,被剥削阶级无论付出多少勤劳和汗水,却仍然不能免受他那个地位所遭受的痛苦、甚至连基本的口腹之欲都难以饱足的真正原因。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便是剥削阶级也注定不能真正达于人生的完美,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只不过有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感到的是被满足和被巩固,无产阶级感到的则是被毁灭。因此,马克思在个人存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社会环境中寻找普遍不幸的根源,既克服了宗教神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幸福论离开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抽象谈论人的平等幸福权利的缺陷,而且表明:他致力于追求的不是某个人的幸福,甚至也不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幸福,而是绝大多数人乃至全人类的幸福。他不仅号召人们为同时代人的完满和幸福而工作,并且将自己的一生全部慷慨地献给了为全人类谋幸福的事业,因为他笃信“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②。

二、“否定的幸福观”的实现路径:消除不幸

任何一个追求幸福生活的人都渴望知道“怎样才能获得幸福”,康德甚至将获得并保证自己的幸福看作个人的一种责任,“至少是间接责任”。所以,通往幸福之路是任何一种幸福论都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幸福”本身的理解:当柏拉图说“德性和智慧是人生的真幸福”时,就已经蕴含着超越肉体感官、在纯粹精神世界中寻求幸福的方法要求了。当奥古斯丁说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与上帝建立联系就是幸福本身”时,追求上帝自然就成了宗教神学所设定的幸福之路。因此,获得幸福的手段和途径就已经蕴含在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之中了。马克思以否定性的方式理解和规定幸福,认为幸福即“非不幸”,是对不幸的克服和消除。他研究阻止人类幸福的社会障碍以及铲除这些障碍的方法,在“消除不幸”这个否定的意义上为绝大多数人谋幸福。

不幸与幸福一样,都是人生的必然存在。一方面,作为一对相互对应的理论范畴,只有当对方存在时彼此才能各自确立。换句话说,没有“不幸”,我们也就无从认识并感知幸福,甚至“幸福”一词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未经历不幸的人生不仅是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对幸福而言也是不利的。长久沉浸在幸福之中,人的幸福感也会产生饱足和厌腻,无怪乎包尔生认为幸福“对幸福本身也是个危险”^①。另一方面,只有当不幸被减缓和清除时,幸福才是可能的。尽力消除不幸也就是最大限度地谋求幸福,它们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背离“不幸”、朝向“幸福”是人生的“定向”,尽管路径各不相同,但方向永远不会改变。这不是来自于趋乐避苦的自然人性论,而是思辨理性得出的必然结论。因此,作为人人都希求避免的一种“恶”,“不幸”对幸福的否定并非绝对、纯粹的,它既是幸福的障碍,又内在地肯定和成就着幸福本身。

早在古希腊时期,快乐主义幸福论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伊壁鸠鲁就用否定性的方式理解和规定幸福(快乐),即“身体上的无痛苦和灵魂上无纷扰”。马克思称伊壁鸠鲁为“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并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将这个规定更为直接地概括为:“善就是逃避恶,而快乐就是脱离痛苦”^②。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理论范畴都是可以通过其对应范畴来予以说明的,幸福即免除不幸,不幸即丧失幸福。与不幸相隔的愈远,与幸福相距的就愈近。此时,不幸既是对幸福的否定,又通过“否定”自身实现了对幸福的肯定。否定的幸福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肯“不幸”的积极意义,即铲除不幸就是为幸福而奋斗。它并无意于宣扬不幸,而是旨在揭示幸福的具体实现路径,即克服与消除不幸。所以,否定幸福观中的“否定”一词有双重含义:一是在形式逻辑的意义上,指作为研究出发点的“不幸”是对“幸福”的否定;二是在“克服”并“改变”现有存在状态的意义上,指研究的目的是减少或消除不幸。马克思致力于揭露、铲除普遍的人类不幸,这是对幸福的“最低限度”的分析,它并不能确保个人必定得享幸福——这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但却能为所有人的普遍幸福创造必需的社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否定的幸福观就是一种“为幸福所必需的社会条件的理论”^③。

马克思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探究普遍不幸的根源,揭示“这种苦难的根源不在个人,而在个人之外,即在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④然而,找到不幸的源头还只是最初的一步。马克思帮助被压迫者挣脱不幸的欲望是那样地强烈,他不希望自己和其他理论家一样,只是追求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理解。“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是要从根本上推翻这些现存的障碍。因此,在“怎样实现幸福”的问题上,马克思“坚决地割断了同纯沉思立场的联系”,也不寄托于资产阶级的慈悲和怜悯之心,更不用节制欲望、修身养性之类的话让工人阶级自我麻痹。马克思采取的是积极行动的立场,他要求人们与普遍不幸的社会根源作斗争,“这也是一种为了个人幸福而进行的斗争,一种为了其本身不足以带来幸福但缺少了它就会带来不幸的条件而进行的斗争”^⑤。所以,马克思否定的幸福观是实践的幸福观、创造的幸福观,它把人们思考幸福的视野从个人引向了社会,又在为幸福而斗争的层面上高度肯定了个人。具体地说,个人幸福的现实可能性有赖于一定的

①[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47-34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页。

③A. Schaff, *A Philosophy of Ma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3, p. 134.

④A. Schaff, *Marxism and the Human Individual*,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pp. 181-182.

⑤A. Schaff, *A Philosophy of Man*, p. 131.

社会条件,任何离开社会历史条件追求个人幸福的企图都是空想;当基本条件尚不具备时,为了获得持久和真实的幸福生活,个人必须起来抗争。当然,抗争的结局也可能是无果或悲剧性的,因为社会机体的严重疾患绝非单个人的力量所能解决。但即使是“抗争”这一行为本身就足以有力地证明人与禽兽的区别了。禽兽总是依附和服从的,恩格斯就曾严厉谴责那些“温顺地服从于自己的命运”和“成了命运的玩物”的人“都是牲口”,而“牲口”是不配享有幸福的。人有反抗的自由,“反抗”不仅体现了人相对于其他物种的特殊性、优越性和高贵性,也使人具有配享幸福的资格。

马克思明确指出,在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的情况下,新时代的幸福是不能用假想的妥协和虚伪的合作等办法来达到的,必须要诉诸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坚决而有力的革命和斗争。因此,现实的任务就是要“使现实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这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就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种革命和运动的基本内容就是扫除像物质资料的匮乏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剥削和压迫、民族的、种族的和性别的不平等这样一些个人幸福的障碍,从而为了尽可能好的社会条件、最大范围和最大程度上的人类福祉而奋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界定——“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表述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幸福条件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为了一种实际目的,即为使人类生活更加幸福而斗争的理论武器”。^①这样,马克思通过“否定的幸福观”,把全人类普遍幸福的人道主义理想与被压迫人们的斗争联系起来,认为只有通过斗争彻底摧毁这个丑恶的发狂的旧世界,才能创造出一个真正寄托自己前程的新世界。从此,“理想并不因此而不再成为理想,而是不再成其为空想。理想成了现实政治斗争的目标”。^②千百万遭受苦难而又渴望幸福生活的人们正是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找到了摆脱不幸的道路,看到了自己的使命和力量,看到了实在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历史上,许多幸福论都提出过“为幸福而斗争”的口号,但这个口号或者是与其理论毫不相干的“偶然的附属物”,或者是在“战胜自我”的意义上要求人们展开内部的自省和超越。马克思幸福论的“战斗性”则是由其理论出发点所得出来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结论——一个从多灾多难的现实人间出发,并认为“人天生是社会的动物,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发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的幸福理论,必然要求人们反对实际生活中的邪恶,为消除普遍不幸的社会根源而斗争。换句话说,“否定的幸福观”必然是革命的、战斗的。在回答自己的女儿“您对幸福的理解”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清晰明确地写下了“斗争”这两个字。斗争当然不是幸福本身,斗争往往意味着分裂与敌对、愤怒与仇恨、危机与忧患、流血与死亡。以斗争为常态的生活,无论贫困还是富足的,通常都远离平静与安宁,充满着竞争、对决与较量。但是,在“这个把普通劳动者变成恶魔”的社会之中,斗争是铲除社会弊病的最彻底的方式,也是被压迫阶级争取现世幸福最有效的手段。对于马克思来说,斗争就是铲除普遍不幸的社会根源,就是“揭露旧世界,并为建设一个新世界而工作”;斗争就是为着那大多数遭受苦难的人能够在大地上幸福地生活着,就是导向新生、导向美好的人类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斗争就是幸福。因此,“斗争就是幸福”并非“只是马克思从人生经验的角度对于幸福的感性的理解”,^③而是“否定的幸福观”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

①A. Schaff, *A Philosophy of Man*, p. 132.

②A. Schaff, *A Philosophy of Man*, p. 109.

③王时:《马克思的斗争幸福观》,《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三、“否定的幸福观”的现实主义特性及其实践智慧

在中西方思想传统中,“幸福”一直占据着特别突出的位置,由此形成了各种各样关于幸福的思想主张。马克思的伟大贡献在于,他放弃了对幸福的不切实际的空谈和幻想,改变了观察和研究幸福的视角(出发点),不是从“幸福”出发来正面探讨幸福,而是从“不幸”出发对幸福展开反面探讨。马克思的幸福观“不是对幸福的意义或构成幸福的那些主观成分的抽象反映,而是一种通过排除阻碍幸福生活的社会障碍从而使为幸福生活创造条件成为可能的变革社会关系的革命思想”^①。与侧重于“向上”至思辨层次的正面的、“肯定的”探讨方式相比,马克思“否定的幸福观”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理论特性。此“现实主义”有三种理解的方式:一是指“否定的幸福观”的出发点和研究方法是现实主义的。马克思“否定的幸福观”从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生活出发,采用的是“着眼于现实”(普遍不幸的社会现实)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或许不如理性思辨显得“精致和微妙”,但却富有强烈的人本主义价值精神,尤其体现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和同情。二是指“否定的幸福观”使“幸福”本身摆脱其抽象性、理想性,成为具体的、现实的。马克思没有直接从事给幸福“下定义”的工作,这并不是说幸福的含义(本质)、构成要素等这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更不能由此认为马克思的幸福论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实际上,在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解放的思想中就已经蕴含了他对幸福本性的理解:作为一种理想圆满的存在状态,幸福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存在状态。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地发展既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终极目标,又是幸福人生的理想图式和最高目的。在这个图式中,“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成为自己的、社会的和自然的主人——一个真正幸福的人。这个意义上的“幸福”是抽象的、绝对的、无限的,是没有任何欠缺的完美存在。它固然可以作为理想或标尺来评判现实,但又是无法完全立于现实之中的。思辨理性和生活经验都告诉我们:绝对圆满无缺的人生是不存在,日常世俗生活中的完满存在总是具体的、相对的、有限的,我们就是在克服与超越欠缺或不幸的过程中体验到幸福的。马克思通过“不幸”来说明“幸福”,这种否定的理解方式有效克服了“幸福”概念的理想性、抽象性,在“消除不幸”的意义上规定了幸福的具体存在样式,让幸福从“理念”变为了“实存”。这样,幸福就不再是不可捉摸、模糊不定的东西,它既是永恒超越的,又是现实存在的。三是指“否定幸福观”通达幸福的道路是具体的、现实的。马克思“否定的幸福观”致力于排除幸福的(社会)障碍,它“没有声称向所有人提供了个人获取幸福的钥匙”,甚至“没有保证将来就不会出现妨碍人类幸福的新的障碍”,它只是要求“消除人类不幸的现存社会原因”,目的是在于为绝大多数人造就幸福的条件和机会,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幸福。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普遍幸福或人类幸福并不是“一下子”就能获得的状态,而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克服一个个当下的、具体的不幸而渐至达到的。这是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它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逐步推进幸福,把铲除普遍不幸的社会根源作为直接目标,使我们在为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征程中抓住了某种“稳定的和明确的东西,即抓住某种易于界说和可以成为社会行动的对象的东西”^②。

马克思“否定的幸福观”是现实主义的幸福观,它关注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种种不幸,提问或思考的问题是“是什么引起不幸”以及“怎样才能消除不幸”。这种提问方式或思考方向当然不如

^①A. Schaff, *A Philosophy of Man*, p. 131.

^②A. Schaff, *A Philosophy of Man*, p. 130.

“什么是幸福”以及“怎样才能获得幸福”那么直接和悦人心意。但是,后者却历来都是让人感到十分困窘的问题。哲学家们给出了种种答案,各式各样的“幸福导师”也在竭力“解密”幸福,为幸福“支招”。可面对“什么是幸福”、“你幸福吗”等诸如此类的追问时,我们仍会顿感“语塞”,一时哑然。^①无怪乎周国平先生坦言:“我对一切关于幸福的抽象议论都不屑一顾,而对一切许诺幸福的翔实方案则简直要嗤之以鼻了。”反观当下,所有人都在为“幸福”竭尽全力、孜孜以求,许多人将幸福误解为对金钱、财富、权势的占有,又在占有之后心生落寞与空虚。“幸福”就像“谜”一样,让现代人焦躁不安,欲罢不能、欲求无门。实际上,在那扑朔迷离、漂浮不定的表象中始终存在着某种稳定、明确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所揭示的:幸福即克服和消除不幸。与时下各种流行的“心灵鸡汤”相比,这个解释虽平淡无奇,但更加具有诉求“人民的现实幸福”^②的人道主义情怀,在饱含思辨理性的同时也更具实践智慧。

首先,马克思主义幸福论超越了“就幸福论幸福”的思维定势,它从幸福的反面“不幸”出发来探讨幸福,既使我们对幸福问题的思考从抽象的哲学层面回到了现实的生活领域,又能使不同的人“什么是幸福”的问题上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同“幸福”一样,“不幸”也具有显著的个体特性。但是,在面临饥饿、死亡、疾病、监禁、各种剥削和压迫的时候,正常的人是不可能幸福的。因此,尽管给“幸福”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十分困难,但人们对(普遍)不幸的理解和感受却是基本相同的。这就是阿玛蒂亚·森在《正义的理念》中所说的,人们对“什么是正义”有多种不同的理解,但在理智思考的基础上,是可以就明显的“非正义”达成共识的。所以,从“不幸”的角度考察幸福,既不用牺牲幸福的主观性,又可以使我们在思想上免于不确定性的困扰。这不仅是研究方法的突破,而且给那些苦觅“幸福”而又深陷迷茫与彷徨之中的人们指明了方向:与其执著于思索、寻找“幸福”,不如着眼于当下的每一个具体的“不幸福”。这并不是对理论智慧的贬低和轻视,而是获得“尘世幸福”的明智选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明智(实践智慧)就是善于考虑对“好生活”有益的事情,从而实现人“能够获得的最大善”。那些执拗地局限于思考“绝对”幸福的人,往往对实际的生活熟视无睹,最终指向的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可以追求但在现实世界中却不可能实现的至善之境。着眼于“不幸”的人则直接深入苦难的现实生活,致力于让生活变得“更加”幸福。这种生活实践固然不如理想主义那样目标高远,但实在、易行、有效,也更迫切、更富感召力。

其次,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要求人们与不幸作斗争,这既是其战斗性、革命性之所在,又克服了“为幸福而奋斗”的形式化、空洞性,使其目标明确、具体。“否定的幸福观”将“不幸”看作是“幸福”的反面,既揭示了二者的冲突和对立,又通过“否定”不幸肯定了二者的不可分割性。换句话说,“不幸”虽是必然存在的,但又是必定要被克服和消除的。诗歌和文学之所以颂赞苦难和不幸,不是因为苦难本身——任何时候,苦难都是沉重、苦涩的,而是人直面苦难时的坚韧意志和反抗精神让苦难散发出巨大的“美学魅力”,这种意志和精神正是源于人对幸福的执著追求。因此,所有渴望幸福生活的人们都必须准备为实现这种生活而斗争,斗争的对象就是“不幸”。每一个具体“不幸”的克服即意味着“幸福”在现实生活中的某种程度的实现,意味着我们向人生的终极目的更近一步。“至福”之人之所以“在一生中幸福”,并非其一生都纯然完满无缺,而是总能“以恰当的方式,以在他的境遇中最高尚[高贵]的方式”^③与不幸作斗争。这种斗争贯穿于求福的全过程,追求不止,斗争不息。所以,幸福是“守不住”的,它永远都在“争取”的过程中。与“不幸”的任何形式的斗争都是向着理想圆满的人

^①2012年,央视《走基层百姓心声》特别调查节目“幸福是什么?”曾以“你幸福吗?”为主题在全国各地街头采访普通百姓,各种“神回复”在电视上真实呈现,使“幸福”成为全民热议话题。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9页。

生之境逐渐逼近的过程,这就是幸福的现实存在。

再次,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科学地揭示了个人苦难的社会性,坚持寻找并铲除制造普遍不幸的现存的社会根源,既都内在地蕴含着在“合乎人性的环境”中为现实的人创造现世幸福的价值追求,又可转化为现实的政治实践,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的“幸福指数”,推进“幸福中国”的建设进程。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保证让每个个人都享有“完全的幸福”(complete happiness),但至少能够不断地减少——如果不能完全彻底地消除——饥饿与贫困、剥削与压迫、集权与专制、罪恶与不公、战乱与动荡等等这些人类幸福的“公敌”,从而为个人幸福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necessary social conditions)。只有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基本公正合理的社会,才值得我们为之慷慨地付出心血和智慧。“否定的幸福观”在“消除幸福的障碍”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衡量一种社会制度或体制、规章价值合理性的标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是致力于为幸福创造这种条件的”,^①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改善民生”所做的所有努力实质上就是向普遍不幸的社会根源宣战,就是为了扫除像物质资料的匮乏、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的不平等这样一些阻止人民幸福的社会障碍,从而为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争取更好的社会条件。当前,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处于并存、竞争之中,只有那种能够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创造更多条件和机会的社会(制度)才能最终赢得人们发自内心的支持与认同。因此,如何消除社会弊病、捍卫并发展已经取得的为个人幸福所必需的社会成果同时具有理论探讨和政治实践的双重意义。为了“让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我们既要“仰望星空”——以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作为人类幸福的理想境地和终极目的,以此规约、引领现实,又要“脚踏实地”——以克服、消除日常生活中实际存在的、明显的不幸和不公为使命,以期在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持续渐进中,不断在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提升人们日常生活的现实福祉。

(责任编辑:杨嵘均)

Marx' "Negative" View on Happiness and His Practical Wisd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m Schaff's Methodology of Happiness

WANG Yan

Abstract: When discussing happiness, Marx started from unhappiness, the opposite of happiness, to investigate the social roots of universal unhappiness. As for him, eliminating unhappiness is a social prerequisite for the vast majority's happiness. Marx' view on happiness, featured by realism, aims at a happiness which is accessible to people in reality. Such a view, rid of the idealization and abstractness of happiness, not only identifies the subjects in our pursuit of happiness, but also encourages us to eliminate universal unhappiness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Hence, it should be the origin from which we draw wisdom. In our daily practice, when pursuing a happy and dignified life, we should take the mission of eliminating universal unhappiness and unfairness, and strive for the happiness of human beings.

Key words: Marx; view on happiness; unhappiness; positive; negative

^①A. Schaff, *A Philosophy of Man*, p. 134.